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八六期 ——
(二〇一一年二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2b)

【往事非烟】	青春剑	陈凯歌
【读书笔记】	当公权力故意缺席的时候 ——读李乾文革回忆录《迷失与求索》有感	胡 平
【网文选载】	话说道歉·再说道歉	老 文
【痛定思痛】	反思“文革”并不是纠缠历史的旧账不放	绿 雄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青春剑

• 陈凯歌 •

—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

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笑，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子。但在当时，这支朝气蓬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

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锻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二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读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况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

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大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有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

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

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L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划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四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

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一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泽东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五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后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得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六

F 的被捕，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 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 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F 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 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 F 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 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背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在我看来，F 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 F 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 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再见 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 G 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

F 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 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 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

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F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纵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

□ 原载：《今天》2011-1-06

~~~~~

## 【读书笔记】

当公权力故意缺席的时候  
——读李乾文革回忆录《迷失与求索》有感

• 胡 平 •

去年，美国的柯捷出版社出版了李乾的文革回忆录《迷失与求索》，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也引起一些争论。李乾是文革时武汉一所中学的造反派头头。邻近学校有一批学生拉帮结伙，行凶作恶，曾多次向李乾学校的同学发起攻击，有的同学被他们打得落下终身残疾，差点死于非命。李乾和老师同学经过商量作出决定，由他带领几个同学，在深夜闯进为首的两个流氓学生的家中，当场开枪将两人打死。10天后，李乾被拘捕，后来被判20年徒刑。

一个年仅18岁的中学生，竟然郑重其事地和几个同学和老师商量，做出把另外两个学生

处以死刑的决定，带着枪，闯进别人家里，当场把人打死。这事在今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李乾在回忆录里详细地叙述了12.5事件（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12月5日）的过程和前后因果，读来令人感慨万端。李乾本人为这起命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在书中也做了颇有深度的反思与忏悔。问题是，很多人发现，对于李乾杀人这一行为，要说清其中的的是是非非还真不容易。

大家都同意，两个死者确实是流氓，是暴徒，理当受到惩罚。但有人指出，惩治暴徒是政府的事，李乾他们的做法是搞私刑，是不许可的。这话当然对。但问题是，在当时，公检法都瘫痪了，很多偷抢斗殴根本没人管。你说该怎么办？私刑是相对于公刑而言的。在没有公刑的地方，私刑二字从何谈起？事实上，在文革中武斗最盛的时期，公检法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很多地方的社会治安相当混乱，不少群众组织都担当起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此说来，李乾带人打击流氓这一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也可以算作正常的。

李乾最被人指责的是他不该把人打死，那两个流氓虽然罪恶不小，但罪不至死。李乾被捕后，审讯他的一位老公安就对他说：“狗日的那些流氓是讨人嫌，但你们不该把他们打死，只要不死人你们一点事没有。”可是从李乾方面着想，如果他们只是把对方抓来痛打一顿，难道不会招致这几个亡命之徒的疯狂报复吗？到头来有可能死伤的人更多。毕竟，李乾他们不是政府。政府拥有绝对优势的暴力手段，被政府打击的一方根本没有报复的能力——此所以政府之为政府。正因为政府掌握巨大的资源，它可以分层次地实施打击，除了处死，还可以关押，可以关一年半载，也可以关十年八年，政府可以开除你学籍开除你公职，可以判你劳改判你劳教，如此等等。在没有政府的地方，在没有公权力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看美国的西部片，那里的人一旦发生冲突，都是二话不说就掏出枪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是牛仔们都特别残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没别的办法，因为在那里没有政府。

那么，文革期间的中国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说是无政府状态吧？不对。在整个文革期间，中国都是有政府的，而且这个政府的力量还十分强大，不容挑战。说是公检法瘫痪，其实不然。如果你贴出一张大字报，点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或者是公开组建一个反对党，那么，公检法马上出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必将随之而至，你无处可以逃遁。回忆录的作者李乾本人，在打死人后不过十天就被抓进监狱，他的亲友战友都毫无办法。可见，当时的中国是有政府的，这个政府还拥有巨大的强制手段。但问题是，在很多一般性的社会治安案件上，这个政府却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这就必然诱发出大量的犯罪，并迫使老百姓采取各种手段自卫，而这种自卫常常会超越公平报复的界限——因为他们想公平报复也很难做得到。于是就导致了民众之间没完没了、愈演愈烈的相互伤害；而这中间的是是非非也就越来越成了一笔理不清的糊涂账。

如果当时的中国真的是没有政府，那么人民必然会迅速地建立起政府，以便维持秩序。但正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是真的没有政府，而是这个政府故意地、有选择性地放弃其基本职责，这才是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我想，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文革武斗。

□ 原载《北京之春》  
~~~~~

【网文选载】

话说道歉·再说道歉

• 老 文 •

◇ 话说道歉

10月21日这一期《南方周末》刊登了当年红卫兵申小珂、胡滨给他们的老师程璧的道歉信，忏悔文革初期对老师的批斗与关押。王友琴女士写了《“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给予热情的夸赞。误差显然有，其实早就有忏悔、道歉的，我们或许不知道罢了。因为这种忏悔与道歉，实属个人行为，往往是在较小的范围里进行。例如11月4日该报头版所载两位记者的《历史深处的来信》，就介绍了一位名叫郭灿辉的当年学生向当年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道歉的，应属“公开道歉”之范畴。

如果说这是口头道歉而未形成文字的话，那么，2007年10月11日《南方周末》就刊登了原都江堰市的中学生田世松的文章：《我曾经批斗过老校长》。文首第一句就说：“时间过去四十余年，可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在‘文革’中批斗老校长韩志学先生的事。”文章介绍了文革伊始作者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得加入“组织”，一个红卫兵开导他要他在批斗老校长的大会上“挣表现”。在那个野蛮残酷、公开折磨人的批斗大会上，老校长跪在乒乓球桌搭成的批斗台上，脖子上吊着几块砖。田同学也略嫌勉强地最后发言，“对老校长来了一番上纲上线的揭发批判”。他的发言未毕，有人给老校长脖子上吊着的砖头上又加了一块，老校长体力不支栽倒跌下批斗台。

次日一早老校长不堪忍受非人折磨以在厕所里悬梁自尽作为最后的抗争。“老校长宁死不屈的抗争不仅震撼了全校师生，更唤醒了我的良知，此后我做了‘文革’的‘逍遥派’，再也没有去加入‘红卫兵’，直到运动结束，再也没有参加过一次批斗会。”应该说，像田世松先生这样，属于同龄人中良心发现者：“我至今仍无法原谅自己，我对当年的不齿行为追悔莫及。在‘文革’中，我这类人虽然不是主角，却有意无意地充当了邪恶的帮凶。最让我内疚的是，毕竟是我那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最后一发炮弹，将老校长的肉体和精神的一道防线，毁掉了！”

我相信，倘若老校长不是宁折不弯地逝去，田先生早就会向老校长公开道歉了。但他已经失去了抚慰自己良心的机会。“四十余年来，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这一天，我都会想起与韩校长在二王庙相遇的情景，会忆起韩校长的音容笑貌，会记起韩校长的谆谆教诲……老校长，我在心中永远对你诉说着无尽的忏悔！”故，说现在才有人“带了个好头”恐怕未必准确，“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实际情况是韩愈那句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人尤其是传媒人士去发掘、报道民间有一定普遍性的良心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所报道的忏悔以及道歉，几乎全都是那些“胁从”者。对于当年那些为恶甚者，始作俑者，并无人挺身而出。《历史深处的来信》介绍说：“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那么凶手必定逾万。可我们只看见宋彬彬们百般狡辩，看不见打死卞仲耘的施展拳脚者有谁肯认账，甚至连目击者指认都看不到。

这与权力需要扭曲历史粉饰太平直接相关。有一个例子说的是周扬，据介绍被他踹出革命列车的胡风、冯雪峰都恪守人格与尊严，拒绝对他落井下石。老周良心大发现，脱离苦海官复原职以后决心立地成佛，一方面从理论上论述“人道主义”、“异化”；另一方面积极向他执掌文化大权20年所伤害的人忏悔、道歉。这就惹得权力者们恼火，有介绍说某大人物曾直白地质问他：“你逢人就道歉，别人怎么办？”那意思其实就是要捍卫红色官场的游戏规则：只许说自己受到冲击之苦，不准提曾经整别人之恶。

毛曰：“凡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这话也是诡辩，不下“罪己诏”的就不亡国了？秦王朝就没下罪己诏，亡得还特别快。学者萧瀚依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数出来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有的还不止一次。以三国为例，唯独没下过“罪己诏”的蜀汉，亡

得最快。《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可见老祖宗早就有明事理的议论，而且还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只是权力崇尚“马克思加秦始皇”，两样货色齐备，此时无须传统文化之“罪己”，只须张扬马主义那套“罪人”。

《历史深处的来信》说：“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这倒是实在话，《人民日报》等大报小报，仅在大跃进时刊登过无数谎言，致歉了么？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以农民为主的百姓，谁向他们道歉？更不必细说一个接一个运动，受迫害者遍及国中，谁为此作过忏悔、予以致歉呢？只有“伟光正”在喋喋不休地唠叨，绝无道歉之可能。既然如此，你又怎能指望那些信誓旦旦要“无限忠于”的乳臭小儿学会反思、学会忏悔、学会道歉呢？这个社会是一个无赖社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诗句早就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

我还读到另一种意见，典型者如网络文章《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其核心意思是：“是这个体制控制的教育，通过老师和校长多年如一日，喋喋不休、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地向学生灌输了这些也许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相信的理论”。换句话说老师们把学生教坏了，大概属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作自受，活该！

不能说此论完全无理，但此论实质上无理。因为首先17年学校教育是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但毕竟未到那等野蛮程度；尽管存在播种仇恨的教材灌输，老师们毕竟还是以人性、良知为本施行教育的，没有哪所学校曾教育学生去滥施横暴。正因此，老毛极端愤恨，搞文革，首当其冲拿教育部门开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嫌那“狼奶”不够浓郁，校长老师们之所以首先遭打杀，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培养学生们的打杀精神！

其次，不但文革前各校皆传达了毛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运动伊始，越是离毛近的地方越惨烈。而第一个罹难的卞仲耘，她的学生就有几乎一半高干女儿，而且包括刘、邓之女。“红八月”只有北京陷入恐怖潮中，离毛主席越远，就越安全。似我等所在山高皇帝远，从小就知道“打人犯法”，遑论打自己的老师！一句话说明白，全国90%以上的学生无涉打老师，绝大多数人都守得住道德与良知的底线。施暴者基本上是些衙内、格格级别的，此番暴行，属于最高层特别指使，是在权力操纵下的特殊动作。试问，当时北京大兴县的屠杀，并非学生所为，难道也归罪于老师或教育体制？毛思想红旗飘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会陷入灾难！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还有，作者显然陷在恩怨是非的泥沼里没能自拔，看不到忏悔、道歉其实并非历史旧账的清算，而是当今社会道德之救赎。作者说：“体制在继续，教育在继续，谎言在继续，恐惧在继续，文革也在继续。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仍旧充斥谎言，仍旧在鼓吹种种仇恨，仍旧在灌输着对强权的服从和忠诚，仍旧不允许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追究产生文革的体制和元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目前的这一切，那么，难道让我们的孩子在再一次爆发后对校长、老师或者其他再来一次道歉和接受道歉？”无疑揭示了现实之真相，可是，过来人之忏悔、道歉，难道不也是一种教育？难道不是为“改变目前的这一切”尽一分绵薄之力？

窃以为，无论忏悔还是道歉，都属于个人自主的选择，本不该过分渲染。但在传媒发达尤其是互联网兴盛的时代，无可避免会成为公共话题。在老毛使得这个民族道德空前堕落的状态下，就连行善助人都得提防惹麻烦，某些人此举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也属正常，恰如记者们所说的，四十四年等一回，敲打一下那些真正该忏悔、道歉的无赖也好。只是估计用处不会大，人家早已怀揣“通行证”，不会也斜眼角哪怕只看一眼你们的“墓志铭”的。可不可以给北岛的诗加上一句：无耻是无耻者护身符？

◇ 再说道歉

《话说道歉》贴出,有网友咨询:说北京的“红八月”是最高层所操纵的,依据何在?还有,“学生打老师”,并非只有北京,各地皆有。于是有进一步说明之必要。还需补充一句:以王友琴女士为代表的众多有识之士,他们孜孜不倦地调查文革中那些几乎被遗忘的人与事,为我们抢救出来许多历史真相。即使作为文革的深度卷入者,此前我根本不知道席卷祖国大地的那些野蛮罪行,竟然也是从中南海那块风水宝地发端的。本文所引述资料除特别说明者外,均采自王友琴、宋永毅、周良霄、顾菊英、杜钧福等人著述。

现在的研究成果表明,文革初期的大字报、发动群众大搞非法斗争,抓人,打人,戴高帽子,逼、供、信等皆源自刘少奇所炮制、毛也批准的“四清”经验。有数据显示,“四清”时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皆系工作组掌控下进行的。文革之初,刘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文革如果按照“刘邓路线”搞下去,同样会是一场浩劫。现在所说“学生打老师”以及有关道歉所涉及,皆“刘邓路线”领导文革之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以及之前的群众都是被运动起来的。恰如王友琴所说:“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分歧,不在整不整人,而在整什么人。毛志在整垮刘,而刘努力使之整到中下层为止。王光美率领工作组开进清华大学,矛头指向蒋南翔,同时也不放过那些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师生。有评述说,刘“四清”开始扶持王光美登台亮相,为毛扶持江青出山搞文革开辟了道路,未必不合理。

刘本人不但指使女儿带头攻击学校领导人,还亲自布置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工作组,定性其校长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接着布置任务:“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文革中违背法制挑起群众残酷斗争基层干部和教师,老刘首开先河。

另一间名校北师大女附中,是高干女儿云集的特殊学校,据介绍占了一半人。这些特权女孩无疑也有着父母那里得来的特殊信息,邓家格格就是兴风作浪者之一。有工作组的权威压着,各校运动尚不至于失控,斗也好罚也罢,总不至于打死老师。毛下令撤走工作组,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指出:“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工作组一撤,勒庞预言应验,恶果立即显现。7月29日邓小平在宣布撤销工作组时传达了毛的指示:“好人打坏人,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也不要打人了。”这是“打人有理”的指示。8月5日师大女附中打死卞仲耘,“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失控状况必难免。更何况,毛等正唯恐天下不大乱,一方面激发“乌合之众”的豪情,另一方面也好给“刘邓路线”增加负面印记。文

革初期的暴力潮，是毛、刘异曲同工的党中央共同制造的。

卞死亡当晚，宋彬彬等向北京市委吴德汇报时，得到“死了就死了”这样轻蔑的结论，并要求封锁消息。次日这个讲话即在女附中广播。18日，当宋在天安门给毛戴上“红卫兵”袖套时，毛那个“要武啊”等于公开赞许举国第一桩校园暴力，而且以此为起点，这股暴力潮以“破四旧”名义涌向社会。《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极力鼓吹，使早已“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的民众意识到它是党中央赞许的。而这种散乱的非组织暴力似乎并不能令权力满意，首都工作组首脑叶剑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委丁国钰、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都是文革初期暴力的指使人。更有甚者，这位李钟奇将军还亲自挥老拳打翻被批斗的彭德怀。

我之所以不同意说49年以后的仇恨教育导致那时的暴力，是因为那种仇恨教育远未达到这等程度；即使能够达到，以前国家法制状况也不可能允许这种暴力恣意妄为。只有一种可能性：最高层需要这种暴力。现在已经知道，大兴县屠杀系北京市公安局所指使，与校园暴力者无关。而尽管发生了红色纳粹在北京市肆虐，恰如勒庞所指出的：“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勒庞大概还不敢想象权力鼓励下这种乌合之众会横暴到何种地步！

据王友琴的统计，1966年8月24日，红色纳粹在北京市共打死40余人。为将这股尚带自发性质（各校自为其阵）组织起来，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余秋里直接插手，25日建立首都红卫兵指挥部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据1967年4月1日当时称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进军报》披露，“西纠”的《成立宣言》及《第一号通令》皆由余指使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惠起草并审定，在石油部印刷厂印刷的。同时，石油部专拨一辆苏制嘎斯六九吉普供“西纠”使用，周恩来也指示周荣鑫为“西纠”安排驻地。

我们不去细细讨论“西纠”活动详情，它成立当日，即25日，红色纳粹打死市民80余人；26日上升至120余人；27日220余人；28日约180人；29日约200人；30日约220人；31日约140人；9月1日升至约300人！还驱赶市民数万户离京，所有这些暴行都是在派出所、居委会配合下进行的。首都北京社会治安之乱象，为拳乱以来最甚，就连日寇占领北京也没造成如此恐怖！当年那篇著名的《红色恐怖万岁》就说：“在北京红色恐怖刚萌芽的时候，中央是从没指责过限制过的，直到红色恐怖形成了，才发出了要文斗的伟大号召，把北京的运动引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期间，公安部长谢富治也担心起来，他弄了个公告草稿送毛泽东，却遭训斥只得作罢；主办北京政务的吴德也向毛汇报北京市的混乱局面，希望准予采取措施降温。吴后来回忆文章写道：“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可见，北京“红八月”狂潮，正是毛亲自关怀下愈演愈烈的！

但很显然，也许是北京的恐怖手段目的已经达到；也许是毛发现红色纳粹保爹妈与之“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道而驰；也许是北京驱赶“黑六类”引起接收地抱怨，毛需要叫停“红色恐怖”。看得见的理由是周之后介绍的毛指示：“他说，你矛盾上交中央，没法处置，矛盾下放农村没法安置，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接收，接收了也没法改造，要给其它单位，不要以邻为壑！主席反对矛盾上交，反对矛盾下放，也不赞成以邻为壑。我说只有消化，主席说得对。回来后告诉剑英同志，后来就改变了。”9月1日周恩来召集红卫兵开会，解释了叫停之缘故，2日北京打死人即由前一天约300人降至约40人；3日10余人；4日只有2、

3人；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明确发出停止杀戮的信号；至10日打死人基本不再。可见这次滥杀狂潮完全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成果！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受控制的行动，绝非“学校教育体制”所能企及的。

从当年权力层的说词亦可看出：9月5日谭震林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人员说：“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他承认有过激之处，但不是抄家打死人，而是“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二十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了，辫子也剪了。”可见打死人尚不在“过分”之列；9月25日叶剑英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及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毛显然采取故意放纵暴力手段制造恐怖气氛震慑社会，正如希特勒当年放纵冲锋队一样。这种手段对于病态提升领袖之“绝对权威”也是极其有效的，就连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之类高官，也惶惶然不知所措，谓之“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只能跟着摇旗呐喊。恰如勒庞所言：“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毛进一步用大串联的方式进一步“发动群众”，首先是北京的红色纳粹如钦差般四出“传播革命火种”，所到之处这才开始暴力泛滥；然后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革命师生”四个字就彻底扫荡了工作组带来的压抑。但毕竟时过境迁，很少能达到皇城根儿那样的规模与程度，却也为日后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奠定了群众基础。

现在产生一些影响的忏悔与道歉，涉及的是文革早期沿着“刘邓路线”整老师、校长时一些跟风者。那些始作俑者也即红色纳粹们是不屑于反思的，他们基本上随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整到爹娘头上而淡出，又随着邓公的改革开放继承权力，没谁有心情去想道歉的事。

刘源2006年在《刘少奇和新中国》里评述：“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这就是说，从“四清”到“学生打老师”，无论整死或伤害多少无辜民众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在1999年《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里，则是另一种描述：“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这样的大变脸，无疑是权力回归程度所决定，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现行体制为什么僵硬地抗拒政改，为什么信誓旦旦要“坚决抵制三权分立”，既得利益的维护已经取代了理想主义之追求，可见一斑。

茅于軾先生有一个说法，称现在一多半中国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不知道其依据何在，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文革状态”，从文章里也没看出有进一步论证的文字。倒是提及“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唯需补充说，健忘是有选择的，忘掉的只是那些权力认为不利的事情，至于他们认为有利的事情，非但念念不忘，还得添油加醋。

茅文还说：“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

茅先生的论述是准确的，统治者为维持权力只能依赖谎言，这使得举国上下道德沦丧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岂止文革施暴者，历次运动那么些踩着他人血泪乃至生命飞黄腾达者，有几个不在继续恬不知耻地振振有词？丛林规则是不屑于忏悔或道歉的，只有文明社会才会认真维护公正。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前东德柏林墙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罪行是他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针对辩护律师关于亨里奇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属于犯罪之言，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这个判例作为“一厘米主权”而著名，它昭示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恪守人性之底线，无以推诿。

因此，在这个“没有了是非感”的社会状态下，尤其值得赞许忏悔者、道歉者的勇气与正义，他们不但救赎了自己的灵魂，也给浑浊的社会空气里吹入一股清新的风。或许并不能扭转什么，因为既得利益者正处于强势。但所有人都会看到，正气是上升着的，无论它开始时多么弱小。而齷齪是不可能永远持续的，除非我们这个民族丧失了生存的愿望。

（2010.11.15 博客，天益杂文）

~~~~~

## 【痛定思痛】

反思“文革”并不是纠缠历史的旧账不放

• 绿 雄 •

这几天反复读《中国青年报》（2010年11月10日第9版）刊登的一篇文章《红卫兵忏悔记》，心情颇不平静。

文章提到湖北省十堰市市民申小珂，系一个“当年的红卫兵”，“文革”初期时，19岁的他曾是北京外国语学校高二学生，当年在教室里曾训斥了该校党总支书记程璧。不料，此举竟然差不多困扰了他整整20年岁月，直至今今年4月20日，他写了一封道歉信，托人带给了87岁的老校长程璧。老校长非常吃惊，很快通过电话告诉她昔日的学生，“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

对那场十年动乱的噩梦，我相信50岁以上的人才会有稍为清晰的记忆。毕竟，1966年至1976年间“文革”闹剧迄今已过去了整整34年，比“一个时代”的时间还长一点。遗憾的是，现在“80后”或“90后”的年轻人似乎没有多少人了解乃至没有听说过建国后还曾发生过这一荒诞不经的历史事件。虽然现在有些人也开始储存、整理和研究“文革”的一些资料的工作，但却仅仅局限于当年发动“文革”涉及高层的一些情况，而对这场波及全国的十年动乱给中国寻常普通百姓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没有进行一番专门的“料理”，以致今天都没有形成一部以百姓为研究对象的“文革学”。

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作家、民俗学者冯骥才为反思“文革”结束十周年，写出了一部《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纪实报告，多少弥补了上述缺憾。冯先生在书中说，“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在他看来，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为此他在《一百个人的十年》出版之际，称还要特意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申小珂这样“当年的红卫兵”人出面忏悔了，对此报道称“内心一直很痛苦”的人还不止他一个，其中有的人“忍不住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如此一来，或许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著名作家巴金老生前曾一再倡议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的目的：“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尤其是”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只是我们对“文革”这场灾难的反思还做得不够，像申小珂这样有勇气能对当年“文革”期间的个人行为进行反思与忏悔的人还不多。记得南非图图大主教曾说过，他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守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我在这里则要说明，图图这位享誉世界的大主教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即只有还原历史的真相，才能达到和解与宽恕。

但不管怎样，我们欣喜地发现，毕竟是有人开始对“文革”期间的行为进行忏悔了，可谓“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冯骥才语）。事实上，自“文革”结束至今34年间，中国在经历了头几年的徘徊状态外，30多年间的改革开放大潮已经席卷神州大地，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当然取决于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高层决策，但也与老百姓的真诚拥护密切相关。正是人民群众已经深刻认识到“文革”动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危机，才会出现人心思定、人心求富以及民富国强的共识，从而为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真理解与拥护，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与民主政治的进程就不能向前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文革”这一痛定思痛之举，就是调动推进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的动力资源，就是为认识过去、把握今天和着眼未来提供了充分的史料准备。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对“文革”仍有两种态度和倾向很是流行，一种是持反对或漠然态度，认为反思“文革”是有意揭开那一段不光彩的党史伤疤，不符合“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流，甚至是借此反对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另一种是以留恋或欣赏的目光看待“文革”中打击与迫害领导干部的野蛮做法，认为这是目前保证反贪污腐败取得成效的借鉴之举，甚至竟然认同“群

众斗争、群众专政”的那一套做法。

应该指出，在有些人身上出现的这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是不奇怪的，这是同我们这些年来仍然没有深刻地反思“文革”或者说没有彻底地清算“文革”留给我们的历史旧帐具有一定的关系。再进一步说，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并鲜明地向80后、90后等年轻人阐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十年动乱历史成因及其教训，造成许多年轻人对“文革”产生迷惘，或者缺乏基本的历史是非判断与识别。

不错，“文革”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非正常的下自而上的“群众运动”，但却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损失。当时毛泽东同志错误地认定我们党和国家内存在着一条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由此做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决策。其实，这场所谓的“群众运动”根本没有什么群众基础，完全是脱离人民群众和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钦定”之举。对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在专门的历史决议中已经明确表态，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既然“文革”是一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理所当然地被彻底地否定。

党的这个历史决议还明确提出，根据“文革”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文革”那个特定的时期，我们党没有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制止这场内乱。因此现在我们不能做出“文革”只是毛主席错误发动但我们党并没有过错的这种自相矛盾的结论。

应该承认，建国后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党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及在经济层面上批判“反冒进”之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和作风已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家长制作风盛行。作为一个大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已经听不进党内外任何不同意见，对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早已弃置一边，甚至公开赞扬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可以想像，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势下，我们党不可能具备一套阻止与减少“文革”的纠偏机制，因而党的威信在“文革”时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一点我们无须忌讳。

“文革”结束后，我们党通过拨乱反正，全面否定了“文革”，重新树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及时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路程。事实证明，我们党既没有隐讳曾有过的十年“内乱”历史，也没有因此背上历史包袱而停滞不前。相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老一代领导集体正确判断了国内外的形势，及时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结论，由此开始了义无反顾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进程。正如邓小平所言“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就这一点说，世界上没有几个政党能够拥有我们党这一虚怀若谷的胸怀，也没有我们党如此坚定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们党终究是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做出了彻底否定“文革”这一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英明决断，从而赢得了民心向背的主动权。

然而，现在依然有一种理论或思想倾向，声称反思“文革”就是反对和否定党的领导。显然，这样的理论或思想倾向是站不住脚的，起码是犯了一个企图割断党的历史的常识性错误。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什么圣人的创造物，因而它不会永远没有过错，只是需要时刻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从而保证制定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修正自己的既定决策，这样做才能有利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才是一个政党不断走向进

步和成熟的显著标志。

另一方面，我们党吸取了十年“文革”的惨痛经验与教训，开始着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针对“文革”中“无法无天”致使法制不健全甚至被悉数弃置一边的状况，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今后只是要花大气力关注如何“有法必依”这一难题。我们完全可以说，厉行法治我们党和国家清算与反思“文革”后作出的最重要的拨乱反正之举，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我国宪法明确昭示：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特别是“文革”时期漠视法律、以“群众专政”代替专门机关进而大搞逼供信等非法活动的做法，从而恢复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应有程序与内容，为进一步实施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与习俗的国家，凡事总爱讲人伦关系，不太讲究制度的安排与监督，特别是对法治这一符合当今世界总的趋势的治理过程反应过于怠慢，即便制定了足够的法律但依然不按法律办事的事例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以党代政”、“以权压法”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怪事。正是由于一些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能依法办事，仍然习惯于以“人治”处理种种事端，就给广大公众造成了法律尊严不敌行政权力的负面印象，结果在遇到诸如贪污腐败盛行的社会现象时，一些人开始或依然寄希望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与批示上。更有甚者，面对日益严重的党员干部腐败现象，一些人竟然留恋和欣赏“文革”时大搞“群众斗争、群众专政”的岁月，以为只有通过所谓的群众运动才可以有效地震慑贪污腐败等违法犯罪。

殊不知，我们一旦离开了法治轨道，任何所谓的“群众运动”都会步入不受法律监督和最终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泥潭。“文革”中不光是身居领导位置的一大批党政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就连众多的普通群众也不能幸免，尤其是当国家陷入了“大批判”和“武斗”混乱状态之后，社会的安定团结也就不复存在，最终受苦受难的依然是万千大众。因此，我们说，这样的令人怵目惊心的内乱局面万万不能重来！我们要讲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对贪污腐败现象要依法大力惩治，还信于民，而对“文革”期间的那套不法做法坚决予以摒弃，绝不能让“文革”那一套假民主真邪恶的卑劣之举死灰复燃。为此，我们还必须具有足够的警惕性。

反思“文革”并不是要纠缠历史旧账不放，而是要从中得出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反思“文革”必须深刻，切忌浅尝辄止，不但要深入地储存、整理和研究“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而且要特别有意识地对年轻一代进行“文革”反思教育，让他们知道今天的改革开放、安定团结与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来之不易，从而愈发珍惜今天和把握明天。我们也相信，既然“文革”是共和国的一段沉重历史，谁都不能随意抹杀和强迫别人忘记这段不幸历史，而是要以此为借鉴，多做做有益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这，才是我们反思“文革”的最终目的所在。

□ 来源：《炎黄春秋》刊外稿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